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金〕王若虛 著

# 王若虛集

上



中華書局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王若虛集上

〔金〕王若虛著  
馬振君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王若虛集/(金)王若虛著;馬振君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7.10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ISBN 978-7-101-12564-1

I.王… II.①王…②馬… III.王若虛(1174-1243)-文集 IV.I214.6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094794 號

責任編輯:張 耕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王若虛集

(全二冊)

[金]王若虛 著

馬振君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9%印張·4 插頁·900 千字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200 冊 定價:98.00 元

---

ISBN 978-7-101-12564-1

本書得到四川省教育廳二〇一六年度  
人文社科重點項目經費資助

## 序

這部《王若虛集》是馬振君博士繼其讀書期間完成的《趙秉文集》後，推出的又一部金代詩文別集整理成果。而且，經過歲月歷練，取得的進步顯著而扎實，「青澀」成分少了，「成熟」成分多了。當然，青澀與成熟是對立統一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青澀意味着稚嫩，同時也蘊育着生機和發展；而成熟儘管汁肥味甘，卻常常與老之將至聯繫在一起。然而，青澀與成熟的轉換，卻是任何一位學者在成長道路上無法迴避的經歷。從這個意義上說，或許保留少許青澀的成熟，才是比較理想的境界。

通覽這部書稿，我覺得有兩點值得稱道：一是選擇底本，精益求精。古籍整理的要點是選擇底本，而底本的優劣關係成果的品質。《淳南遺老集》現存版本衆多，一般認爲《四部叢刊》本較爲精當，振君起初也是沿着這個思路做的。但是，當他窮盡自己所能見到的版本之後，經仔細比勘，發現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較之其餘諸本，《畿輔叢書》本所收條目最全，文字錯訛更少，應當是比較理想的版本，因而決心改換。雖然這需要從頭再來，增加

許多工作，但是，如能珍惜每次在學術上可能獲得進一步提升自己的機會，那是非常值得的。正如俗話所說：有付出才有收穫。

二是有所發現，追求創新。以整理成果命名為例，如沿用《淳南遺老集》，既為學界熟知，也順理成章。但是，在輯入《尚書義粹》這部散佚已久的王氏著述後，稱之為《王若虛集》就比較合理了。這次整理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發現了明人李濂的《尚書義粹序》。振君自稱「意外發現」，實際是「必然」中的「偶然」。就我所知，這位年輕人一向治學勤奮，每年都利用寒暑假，遠赴京滬寧粵等地收藏豐富的圖書館訪書，稍有綫索，即一查到底，一定弄個水落石出。那篇書序驅散了王氏《尚書義粹》傳播過程中的迷霧，將其中一些失落的環節銜接起來，向學界揭示了金代產生的這部學術著述是怎樣保存下來的。

近年來，金代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一些熱衷於這個領域的年輕學者向前邁進的步子越來越大了，令人欣慰。在此集行將付梓之際，振君請我寫幾句話置於卷首，是為序。

薛瑞兆

二〇一七年三月於內江

# 前言

王若虛（一一七四——一二四三）是金代著名的學者與文學家。其字從之，號慵夫，晚號滹南遺老，藁城人。世以農爲業。父名靖，以子貴贈朝散大夫；母石氏，贈太原縣太君。若虛自幼聰穎過人，從舅氏周昂學，又師事古文家劉中。登承安二年（一一九七）經義進士甲科第，歷管城、門山二縣令，正大末官至翰林直學士<sup>①</sup>。金亡，居鎮陽。癸卯歲（蒙古太宗乃馬真后稱制二年，一二四三），游泰山卒，年七十。嘗與修章宗、宣宗兩朝實錄，著有《慵夫集》（佚）、《滹南遺老集》四十六卷、《尚書義粹》（又名《滹南書義》、《經義新式》，殘）。

## 一 《滹南遺老集》的學術價值

《滹南遺老集》四十六卷。其中，三十七卷「辨惑」文字構成全書主體，爲讀書札記體，特點是有感而發，考據與義理相參，形式靈活，內容廣泛，按《四庫全書總目·子部總叙》云「羣言岐出，不名一類，總爲薈粹，皆可採摭菁英，故次以雜家」<sup>②</sup>，將其歸入雜家。此外，還

有《詩話》三卷。「詩話」及詩文作品，約占總篇幅的五分之一。

### (一) 經學辨惑的價值

金代文獻傳世者少，經學論著則更是寥寥<sup>③</sup>。集中有關經類辨惑文字計八卷，是就漢、唐、宋的經解、經說、訓詁等方面的研究與評論，代表了金代經學取得的成就。因而關於王若虛的經學研究也就構成了中國經學史的重要一環。

需要說明的是，金朝繼承遼宋科舉制度，從國家層面引領士人從事經學的學習與研究。自天會至正大百餘年間，除海陵、世宗兩朝一度取消經義選舉外，經義科與詞賦科及策論科一直長期並行，從而激發了士人研習經義的熱情。由於「辨惑」著述多具有科舉考試參考書的價值，因而極大增強了士人的需求，成為學者以更大熱情投入研究經學的動力。此外，金朝與南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促進了南方經學著述通過權場流入北方社會。這些因素為金代經學的興起創造了必要條件。

自北宋時，疑古思潮盛行，王若虛受其影響，解經也常舍訓傳而斷以己意，表現出一種「通經致用」的學術取向。貞祐南渡後，隨着金朝國勢遽然衰落，言論禁忌也削弱了。王氏或情不自禁地借經學義理表達自己的見解，從而形成了他此類文字的特點。如《五經辨惑上》第三條論《左氏》所立弑君之例的不合理，指出：「稱臣為臣之罪，則稱君者非臣之罪乎？稱臣為不義，則稱君者果臣之義乎？君非上聖，誰無失德？使此說果行，可指為無



道而弑之矣。……要之，既曰弑君，則罪有所歸矣。一人弑之，罪在一人；衆弑之，則罪在衆。不容有輕重於其間也。」有金一代歷經九朝君主，竟發生金熙宗、海陵王、衛紹王三朝君主被弑事件。顯而易見，王氏議論是有感而發的。

王若虛秉承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思想，對前人學說或批判，或繼承，或揚棄，表現出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如《論語辨惑序》以爲，「舊說多失之不及，而新說每傷於太過」。其《總論》則將「太過」具體化：「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於深也，過於高也，過於厚也」，強調解經要有一個「度」。在他看來，聖人也是人，其言行應符合「人之常情」，「明白而易知」。只有如此解讀聖人言行，才能將「中庸」之道體現出來，使其說傳之更久。因此，把聖人拉下神壇，揆以「人情」，作出合理說解，這是他較之前人的高明之處，也是「辨惑」的價值所在。

再如卷一《五經辨惑上》第四條，就《左傳·隱公元年》評價穎考叔「純孝」之說，王氏以爲穎考叔「舍肉遺母，特以發莊公之問，而爲人言之機」，不能由此就肯定他「純孝」，否則就是「譽之太過」。這段疑經之言即是運用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典型實例。應該說，他的見解較「純孝」之說更有道理。

再如卷二《五經辨惑下》第七條：「《禮器》云：『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此最害理。夫聖人制禮，未嘗不出於人情，而曰近之者『非其至』，是豈君子之言耶？」其論以

「近於人情」爲價值取向，逆傳統而言之，更具說服力。

王若虛經學辨惑涉獵甚廣，漢、唐、宋重要的經典注疏、子史著述、學者文集等都有引述，卻不囿於前賢，而能堅持知人論世，遂使新意迭出，爲經學史注入了新鮮血液。

## （二）史學辨惑的價值

此類文字十六卷，如加上《君事實辨》二卷、《臣事實辨》三卷，共計二十一卷。此外，其他辯論亦屢見涉及史學問題。這些文字涉及南宋以前的十七史、《資治通鑑》及歷代史學家著述，徵引廣博，代表了金代史學所達到的水平。

北宋史學略分爲兩派：考辨疑古派和褒貶義理派。而後者對金朝與南宋的史學影響很大，以至於不少學者都卷入褒貶義理的潮流之中，執着於正閏、名分、義利等範疇而爭辯不休。章宗朝廢止薛居正的《舊五代史》，改用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標誌着金朝對褒貶義理派的接受。在這樣的背景下，王若虛從考辨疑古的立場出發，開始了他的史學研究，並在金後期的史學之苑中結出了豐碩成果。

王若虛的考辨疑古思想表現爲：在史料、史實的考辨上窮源竟委，在史例、史法方面則追求質實得宜，在語言、語法上力求文從字順而不以辭害意。王氏嘗與修章宗、宣宗實錄，深切感受到「實錄」秉筆直書傳統的重要意義，因而對歷代史書「伐善」「隱惡」等弊病，以「辨惑」形式一一揭出，毫不留情地加以抨擊。他堅持「實錄」精神，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表明他對良史之風的不懈追求。如卷二十《諸史辨惑上》云：「一切異說不近於人情者，雖託以聖賢，皆當慎取，不可輕信也。」又如卷三十一《著述辨惑》第十條云：「張九成談聖人之道，如豪估市物，鋪張誇大，惟恐其不售也。天下自有公是公非，言破即足，何必嘖嘖如是哉！」

因此，清代學者施國祁評曰：「金季士大夫多喜逃虛養名，高自位置，假借於道學，汨沒於禪機，趙閑閑、李屏山其著也。求其潛心砥力，本經、史、《通鑑》之學爲指歸，生平不衍太極圖，不作葛藤語者，惟王溥南爲然。」<sup>④</sup>當代學者葛兆光亦曰：「它不僅在史學思想、歷史編纂學和歷史史料學上繼承了劉知幾和北宋疑古考辨的進步史學思潮，還在個別方面拋棄了他們的陋習，彌補了他們的缺陷，與南宋史學中的空疏、穿鑿、附會等流弊分道揚鑣，另闢蹊徑，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元好問《遺山文集》卷十九《內翰王公墓表》記載當時人們將王若虛的史學與劉知幾《史通》相比，今天看來固然過譽，而在當時，卻恰好反映了一個這樣的現實：王若虛的確是金代史學的批判者和總結者，《辨惑》的確是金代一部傑出的、有真知灼見的史學批評考辨著作。」<sup>⑤</sup>應當說，這些意見比較恰當地概括了王氏的史學成就。

爲：  
同時，關於溥南辨惑亦不乏批評。如施國祁《禮耕堂叢說·繡谷寫本溥南集說》以

若《君事實辨》之宋征李煜，極推周世宗之德度；《臣事實辨》之晉伐孫皓，反病羊叔子之失謀。大抵南渡後，北拒蒙古，屈不得伸；南綴宋人，仰不能俯。四郊多壘，國勢日孤，一時朝議，要以和親和議爲長策，而豈所論於孫吳、南唐之已事耶？司馬《通鑑》於曹操多恕詞，而《辨》中前言「溫公論操篡漢，取之盜手。失言之罪，萬古不磨」，後乃言「正閏之說，吾從司馬公」，則大惑矣。

所謂孫吳、南唐已臣服晉、宋云云，似比附不當。女真王朝雖戰敗而亡，屬「力盡乃斃」，其「國君死社稷」<sup>⑥</sup>，爲史所贊。這與施氏所舉前史之例截然不同，也與後來南宋君臣舉國降伏蒙古迥然有別。至於所引溥南關於司馬光前後矛盾之論，亦不應「大惑」。金代史學關於三國正朔，頗受兩宋影响，多貶曹魏而向劉蜀。溥南王氏偶有異議，何罪之有？

溥南「辨惑」存在的問題，首先是缺乏系統性，表現爲漫談式的筆記，即俗語所謂東一榔頭、西一筍帚，不過這是中國古代學者的思維習慣與特徵。當時的文話、詩話、詞話、曲話之類，莫不如此。

其次是受歷史及個人學識等局限性的制約，或有失偏頗。如卷十一《史記辨惑三·取捨不當辨》第一條：

遷史之例，惟「世家」最無謂。顏師古曰：「世家者，子孫爲大官不絕也。」諸侯有

國稱君，降天子一等耳，雖不可同乎帝紀，亦豈可謂之世家？且既以諸侯爲世家，則孔子、陳涉、將相、宗室、外戚等，復何預也？抑又有大不安者，曰紀、曰傳、曰表、曰書，皆篇籍之目也。世家特門第之稱，猶彊族大姓云爾，烏得與紀、傳字爲類邪？然古今未有知其非者，亦可怪矣。然則列國宜何稱？曰「國志」、「國語」之類，何所不可？在識者定之而已。

淳南王氏以爲「世家」乃「門第之稱」，不能與紀、傳並列。這種認識即比較膚淺。當代學者趙生羣《〈史記〉編纂學導論》已給出合理解釋：「《史記》中「世家」的內涵，是指某種事業後繼有人。「家」並非專指王侯之家，「世」也不僅限於子孫相繼。」<sup>⑦</sup>

再次是體例不够嚴謹。如《孔子家語》、《史記》本屬子部和史部，而淳南王氏卻將有關辨惑文字歸入《五經辨惑下》，就顯得名實不符了。且《五經辨惑》上下僅涉《詩》《書》《禮》《春秋》四經，未論及《易》，故不當稱「五經辨惑」。再如，將《論語辨惑序 總論》獨立爲一卷，也有乖於編排邏輯。

四庫館臣有曰：「統觀全集，偏駁之處誠有，然金元之間，學有根柢者實無人出若虛右。吳澄稱其「博學卓識，見之所到，不苟同於衆」，亦可謂不虛美矣。」今天讀來，仍不失爲中肯的評論。

## (三) 文獻學價值

文獻典籍的流傳使用是文獻學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研究學術傳播發展的可靠依據。如前所述，王若虛「辨惑」引用了大量典籍，包括漢、唐、宋的經史子集，如經部的《十三經》（除《易經》外）、《四書集注》等，史部的十七史、《史通》、《資治通鑑》等，子部的《孔子家語》、《荀子》、《莊子》、《呂氏春秋》、《東坡志林》等，集部的《唐文粹》、《昌黎先生集》、《柳河東集》、《嘉祐集》、《東坡全集》、《山谷集》等。考察這些典籍在「辨惑」中的引用、考辨與評論，有助於了解以王若虛為代表的金代學術思想淵源及其探索的廣度與深度。

此外，《淳南遺老集》還比較多地保存了金代訓詁材料，對於研究當時訓詁成就具有不可或缺的價值。王氏將「訓詁」作為「辨惑」的重要工具之一，在許多條目中都有應用。他不迷信經典，不盲從前賢，堅持以「人情」解經論史，既肯定前人訓詁中的合理因素，也對那些牽強附會、不合常情之說予以揚棄。如卷二《五經辨惑下》第二條就鄭玄「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等說法加以評論：「予謂哀戚之至，無暇避嫌，先王制禮，亦必不委曲至此，特出於漢儒之私意耳。」即從人之常情出發來解經，而批駁鄭玄的「委曲」先王之禮和以「私意」解經的弊病。

再有，善於利用語法、文勢訓詁。「辨惑」有關語法和文勢的訓詁用語很多，如「道不得」、「不安」、「下不得」、「不成文」、「不成語」、「語法不順」、「文勢為悖」等等。如卷十九《史

記辨惑十一》：「《荆燕世家》云：『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諸劉』字絕下不得。其曰『燕王劉澤，諸劉遠屬』，則是矣。」

再如卷二十《諸史辨惑上》第二十八條：「申屠嘉劾奏鄧通戲殿上無禮，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私』只是愛幸之意，猶所謂弄臣者耳。而師古以爲『欲私教戒』，恐非也，不然『私』字詎能兼教戒之義邪？』這些都屬於利用語法、文勢、語境作出判斷，加以訓釋。

王若虛爲深入揭示詞彙的意義而引用大量文獻語料，或證以方言俚語，這使他的訓詁方法更精密，準確性也更高。如卷三十三《謬誤雜辨》第四、五條分別訓釋「寧馨」、「阿堵物」即是。應該說，這些「辨惑」文字體現的訓詁思想與方法，有許多同現代語言學理論暗合，如「義素」等等<sup>⑧</sup>。從這樣的意義說，其集也是研究金代語言學的重要文獻。

王若虛的「辨惑」文字相當於雜家的讀書札記，從校勘角度看，也可視爲一種脫離文本的校勘記彙編，他嫻熟使用各種校勘方法，並結合訓詁考據，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如卷十五《史記辨惑七》第四十六條：「《郭解傳》既稱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而後又云『爲人短小，不飲酒』，何邪？雒陽人有相仇者，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庸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疑重用『待我』字。」清代張文虎《史記札記》卷五也有類似看法：「此『待我』字涉下而衍，《漢書》無。」新修訂版《史記》即據張說而刪「待我」二字。王、張二人都採用理校法，並得出相同的結論，而王說較張說早出六

百年。

再如卷三十五《文辨二》第二十三條，在論及刻本墓誌文字與對應的拓本文字有所不同時，引南宋茆璞語以表明自己的意見：「碑本蓋初作時遂刻之，中間或有未安，他日自加點定，未可知也。若初本不同，當擇其善者取之，不必專以石刻爲正。」這種對文獻文字優劣的評判，以其從實際出發，合乎「人之常情」，而成爲真知灼見。

應當指出的是，王若虛如此致力於校訂文字，在於正確闡釋義理，揭示心得，以達到「通經致用」的目的。但是，他的校勘成果在現代古籍整理中尚未得到必要重視，並加以借鑒、應用，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 二 《淳南遺老集》的詩文理論與文學創作

王若虛的三卷「詩話」是唯一完整流傳下來的金代詩學著作，與其「文辨」共同反映了王若虛的詩學理論和文學主張。

從先秦莊子的「得意而忘言」，到金代的「文章以意爲之主」，「言意之辨」或者說語言形式與思想內容之間的關係問題，一直是「文藝理論」範疇的焦點問題。也就是說，形式主義和反形式主義的爭論幾乎貫穿於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各個時代。自金初宇文虛中、蔡松年、吳激等人在創作實踐中注重情感的自然流露，規避雕琢，至中後期蔡珪、党懷英、王庭



筠、周昂、趙秉文等人繼踵發揚，並在理論總結方面不斷加以深化。這些都為王若虛文學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同時，他還與當時文壇崇尚奇險文風的代表人物李純甫、雷淵等人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論爭，進一步強化了其文學主張的理論取向。

王若虛文學理論的核心是尚意崇實，他的許多論述都具有通俗易懂、旗幟鮮明的特點。如卷三十八《詩話上》第二條云：

吾舅嘗論詩云：「文章以意為之主，字語為之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其病矣。又曰：「以巧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為巧，所謂遊戲者，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

王氏借舅氏周昂之論表明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以意為之主，字語為之役。」以此為基點，他提出了許多與之相輔相成的見解。如「夫文豈有定法哉，意所至則為之」（卷三十六《文辨三》第二十四條）；「天生好語，不待主張苟為」（卷三十八《詩話上》第四條）；「古之詩人，雖趣尚不同，體製不一，要皆出於自得。至其詞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者」（卷四十《詩話下》第四條）；「定體則無，大體須有」（卷三十七《文辨四》第十八條），等等。他強調文章無定法，詩句出於自得而不事雕琢，不拘泥於體製等等，既主旨突